本版编辑：李少军
E-mail：t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049

学而思

“主敬涵养”的修养方法

□ 沈小勇

中国传统从政修养学说特别强调“修”与“养”，“养”乃是一种养心、养性。儒家修身哲学既重视“以仁政为先”，更突出“以克己为本”，并形成了一整套“主敬涵养”的修养方法论。中国传统修身哲学的“敬”，乃是一种敬仰、敬畏、敬重，诚如古人所言“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主张修身有敬、事天有敬、待人有敬、治事有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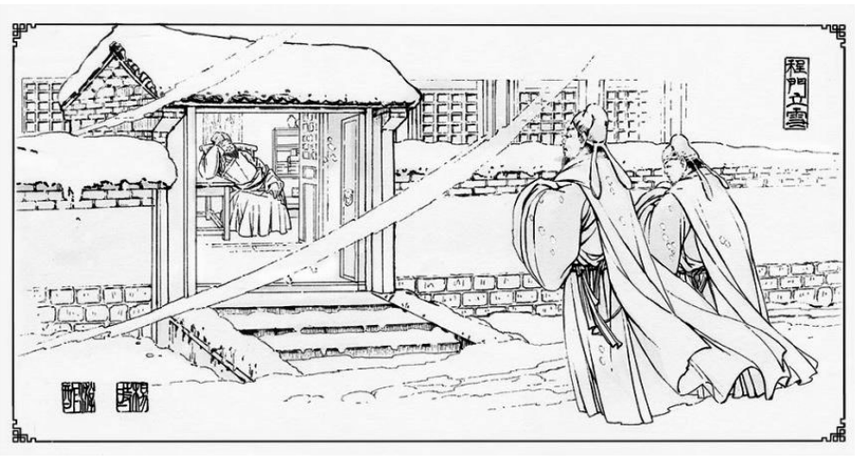
朱熹指出：“德字从心者，以其得之于心也。”王阳明提出“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这些观点都是强调修身养心的重要性。曾国藩在其早年修身十二款中特别强调：一、敬；二、静坐；三、早起；四、读书不二；五、读史；六、谨言；七、养气；八、保身；九、日知所无；十、月无忘所能；十一、作字；十二、夜不出门。其中，第一条款就是“敬”，“敬”可以说是儒家强调的一种虔诚状态。在曾国藩晚年日课四条中，更是提到：一、慎独则心安；二、主敬则身强；三、求仁则人悦；四、习劳则神钦。

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的“主敬涵养”的修养方法论，主要突出强调了三点：一是“诚意”。《中庸》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在中国哲学中，“诚”是一种具有哲学本体论意义的命题，强调立身处世其根本则在“诚”。所以，《论语》中讲：“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天命”是首先必须要敬畏的对象，人的言行不能欺天，勿与天地斗巧。

二是“正心”（正志虑）。志虑之正，是正心的根本。吕坤在《呻吟语》中讲：“一念收敛，则万善来同；一念放恣，则百邪乘衅。”往往就是一个念头，善恶则分。古人非常重视在日常生活中的志虑之正。《菜根谭》中讲：“无事便思有闲杂念想否？有事便思有粗浮意气否？得意便思有骄矜辞色否？失意便思有怨望情怀否？”唐朝张九龄特别提出十二个字的主张：“正志虑，端形体，广学问，养性情。”首重正志虑。宋代欧阳修则提出“内正其心，外正其容”的八字主张，强调要从内心深处先修炼自己的志虑，内外兼修。那么，“正心”要“正”到何种程度呢？孟子曾提出“不动心”的思想，“我四十不动心。”焦循这样解释：“志气已定，不妄动心。”孟子的“不动心”工夫是不假外求、完全求之于内的，这样心才能役物，而不是役于物，否则就“陷溺其心”，而“不动心”则强调“心”要“配义与道”，要“行己有耻”。在中国哲学史上，王阳明“道德自律”说很值得我们今天重视。他提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命题，主张要从内心寻找天理的根据，强调“心即理”“心外无理”，“圣人之道，吾心自足”。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反对知行相分，在他看来，知而未行等于未知。所以，王阳明特别强调：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三是“变化气质”。古人提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别，特别强调要通过主敬涵养，变化自身的气质，以“气质之性”达成“天命之性”。因此，张载主张“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程颢主张“学至气质变，方为有功”。“变化气质”的功夫是一个由内而外的修养过程，也是一种人生的磨炼。诚如古人所言：“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锻来；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须向薄冰上履过。”只有经过了这样的涵养功夫，才能达成从容、镇定和历经磨炼后的成熟，真正达到《格言联璧》中讲的“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通过不断修养和变化气质，追求理想的人格境界。

中国传统从政修养主张主敬涵养的修养方法论，正是要告诉我们要有所敬畏，要至诚至拙，要特别注意正志虑，修内心。一些人奋斗几十年，只因一念之差，一件事没有把握好，就可能栽个大跟头，从一个领导干部沦为阶下囚，其根本在于放弃了“修心”。因此，领导干部要特别注重内在的修养方法。制度尽管很重要，但是同样的制度情形下，有的人却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可见内心世界的差距非常大。传统从政修养学说告诉我们，“以克己为本”不是和自己过不去，而是为了自己过下去，走得更长远。



书而思

编者按：从语言的变化来分析社会转型、社会心态、社会文化，是一件庞杂艰巨的工作，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历史档案价值和社会实践价值。

语言折射社会变迁

□ 丁国强

语言是一种社会行为，语言既是社会的积淀，又是社会变迁的反映。孙剑艺等撰著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称谓分期研究——社会语言学新探》（以下称《新探》）是一部语言史，也是一部社会史、一部精神史。

语言的变迁折射着社会的变迁，语言的解构反映着社会的解体。语言现场已难以还原，只能从广博繁杂的语料中发现历史。《新探》一书提供了观照20世纪社会史的全新角度。20世纪的中国，动荡、革命和社会变革交织，伴随着语言的焦虑和浮躁。葛剑雄说：“语言（包括方言）的选择和流行绝不取决于语言本身，更不是人们对语言或方言进行比较研究后作出的理性选择。”“说到底，语言问题不是语言学问题。”语言变革是社会变革、思想变革的一种表征。语言形态、语言环境、语言资源的变化在社会压力下造成的。透过语言状况来考察当时的社会状况是一件富有难度和深度的工作。时代是一个大的语境。每一代人都脱离不了他们那个时代，自然也无法脱离那个时代的语境。一个时代的言说塑造了那个时代的生存形态和精神形态。该书绪论指出：“整个20世纪是一个社会动荡、社会变革最为频繁的百年。无论是一场接一场的战争，还是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或者由政治向经济的跨越等，都必然引起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诸方面的种种变化，引起社会的阶级、阶层、集团和群体的重组，引起人们政治经济地位与社会角色的改变，引起人们观念认识上的变化。由于词汇的社会敏感性，这种种一切，必然会在社会称谓词语上面体现出来。20世纪社会变迁的这种特殊性，也就使得百年间社会称谓词语发展变化研究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

《新探》一书通过梳理“洋人”“外国人”“教民”等称谓，发现清末官场弥漫“官场恐洋综合征”，与老百姓对洋人的仇恨形成语言上的对立。不同的称谓显示出不同的阶级立场，语言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一个病入膏肓的时代，注定无法保持语言的纯净。托克维尔敏锐地发现，官场的堕落先从语言的堕落开始，“两个时代的行政语言，并没有彼此迥异之处。它们的风格同样没有文采，就像流水账，含糊而软弱；撰写人的独特面貌被埋没在普遍的平庸之中。省长的文字和总督的文字一模一样。”晚清官场的语言腐败、语言堕落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语言的虚伪性被发挥了极致。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终结了王朝循环，也改变了政治语境和话语方式，“大总统”“内阁总理”“国务员”“议员”等称谓成为当时语言的核心词汇。虽然语言上的变化与思想的觉悟相去甚远，但是，语言变革必然带来思想和心态的变化。话语也是一种政治参与方式。孙中山说：“民国总统，职曰公仆，一切僭制妄作，宜即废除，庶几气象一变。”辛亥革命粉碎了臣民话语的政治基础。称谓的变化成为革命的表征。政体革命带来了语言的革命，而语言革命则成为开民智的先声。章士钊说：“孙逸仙者，非一氏之新私号，乃新中国新发露之名词也。”语言启蒙看似表面实则发挥了不可忽略的破局作用。新词的运用迅速转变了社会风气，民主共和迅速成为强势话语，这对于瓦解封建专制话语、增强对民主宪政的认同做出了特殊贡献。尽管其中不乏浑水摸鱼、趋炎附势者口是心非、滥用语词，但是，语言逻辑对于思想逻辑的影响还是不可小觑的。“阁员”“议员”等角色在民国政治中多是摆设或军阀争权夺利工具，但是，名号所代表的政治文明和共和精神却成为民国政治生活的发酵剂。

社会称谓凝结反映着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阶级斗争和阶层冲突。近代中国，“新”与“旧”的观念和势力对立交织，社会分层十分复杂，社会称谓也频繁变化。称谓的变化是口头上的，心灵的嬗变却需要启蒙来完成。孙中山痛感“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名不副实的民国有太多名不副实的称谓，甚至连“革命党”的称谓都有人质疑。章士钊就认为，“革命党者，非政党也”，他的理由是，“凡政党者，皆求于现行国家组织之下，相迭代用，以施行其政策也。故凡政党，不得含有革命性质”。对民国时期的社会称谓进行词义考察，就会发现称谓后面的政治立场、文化态度颇耐人寻味。王人博先生就发现，孙中山在使用“人民”这个词时，总是抱着尊敬的态度，而一旦改换成“民众”，其态度则是蔑视的。

面对“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名”与“实”之间的关系并不分明，其中不乏“假借立宪之名，行抵革命之实”的两面三刀，但是，对于语言的浸染作用，也不应讳言。语言影响了人们的表达方式、思考方式和交往方式。金观涛、刘青峰在《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一书中运用数据库方法，对《新青年》等杂志的关键词如“国民”“个人”“群”“社会”“国家”等进行了统计分析。金观涛、刘青峰认为，这些词汇对于中国现代常识理性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常识是逻辑、修辞和语境的结合。将新观念转化为常识，需要一段艰苦的语言历程。只有将语言与生活紧密连在一起，常识才富有生命力。

书海泛舟

忧世之心 笑骂之言 劝善之意

——读《桃花扇底看前朝》

□ 徐海娜

最近我读了许石林先生的历史随笔《桃花扇底看前朝》（后文简称许书）。该书益人神智、发人聪明、广人之识、动人鉴戒，值得一读。

“动人鉴戒”

“古代王朝的能量”讲了关于明代朱元璋、宋代赵匡胤以及明代洪熙、宣德帝的几个故事，让读者从人性的侧面看到封建王朝开国皇帝和中兴帝王所以能创造盛世的正能量因素。

“宋仁宗的饮食”讲了宋仁宗的几个小故事，一次是宋仁宗晚上饿了，特别想吃烧羊肉，但没有召唤侍臣，原因是宫内有任何要求都会被当成永例、制度供应不断。特别想吃而忍着不吃就是怕吃这一回，就让今后每晚杀羊成为制度。（“诚恐自此逐夜宰杀，则害物多矣。”）还有一次，宋仁宗游园口渴，看到随行人员没有带烧水镟子，忍渴而归。嫔妃问起，回答说恐一说出就会有人受处罚，就没出声。许书总结，宋仁宗以自己的行止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尊贵，尊贵就是自律，是比他律甚至刑律更高的要求，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行己有耻”“有耻且格”。近几年落马的“大老虎”们，如果但凡有些许“自律”精神，能够“行己有耻”“有耻且格”，也不会于囹圄之中落下悔恨的泪水，成为举国观思的反面教材。

同样说饮食，“美食背后”讲到雍正皇帝一则小事。史评雍正为人峻刻，也并非全是贬损。峻刻是清廉、无欲的另一面。清宫档案记载，雍正很不喜欢浪费，他曾给内务府下诏，专门说后宫吃剩下的饭菜的处理问题。除了陈述反对浪费的道理，还有具体指示：后宫吃剩的饭菜，不能浪费，打包给后宫保安、保洁等人员；他们吃不了的，可以给后宫豢养的宠物，宠物吃不了的，可以晒干保存，给园子里的小鸟去吃。食尽其用。时下，世界上饱受战祸之害的地区、欠发达的地区，仍有许多人包括婴儿因为食物短缺而死，而同时在其他物资充裕地区却仍然存在大量食物浪费现象，这个故事的教益并不过时，它所反映出来的并不是雍正这个“峻刻”皇帝的悭吝，反而是其深悉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半丝半缕物力维艰的悲悯之情。

“发人聪明”

“声色势利怒爱昏其智矣”中讲，曾国藩在教导李鸿章办洋务外交时，针对李的“痞子腔”说了一番道理：“圣人言忠信可施与蛮貊”，洋人亦通“诚”之人情。在没有实力的情况下，无论如何“虚强造作”，对方都会识破。不如推诚相见，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不至于太过吃亏。脚踏实地，最终站得住的是自身的信用身份，此理古今相同。首先，体现在大的国家政策方面。2013年10月，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上，习近平以“亲、诚、惠、容”对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理念进行定调，做出了“中国周边外交顶层设计”。其中之“诚”与前人所说的均是以诚相待之“诚”。虽然中国今日之实力与过去不可同日，但“诚能动物”的道理依然。诚信的现代文明国家的必备要素，也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可与之交”的身份名牌。无论内政外交，诚信无小事，其所涉及国民风气，经济活动、政府信誉、国家形象等，说是立国根本精神之一并不过分。其次，体现在做人行事方面。许书中总结，“虚强造作”就是心怀妄图，而“名于成败者，要在去妄。妄心干扰公心，公心未明，虽人君圣贤亦不免自我蒙蔽”。一旦存了妄心和私心，受声、色、势、利等外物，怒、爱等情感所扰，一定会蒙蔽心智，圣人也不能得免。因此去利、去私，存公心，是不让“声色势利怒爱昏其智”的最好办法。

“谨慎应酬无懊恼，耐烦做事好商量”这一小节中讲述了明朝兵部尚书刘大夏、绍兴乡绅胡囧卿、硕儒陈白沙面对突发的羞辱事件，以自身的远见、宽厚的性情和如山的定力或远避灾祸，或免于折辱的故事。借此提出，“大凡经济俗务，非有耐烦忍辱的脾性不可，而读书人多止于洁身自好以为高尚，故遇事颇不耐烦，更不能丝毫忍辱”。准确地描述了许多读书人中存在的通病。这份忍耐功夫修养的缺失或曰不足，使读书人未能将自己的满腹经纶与政务系统充分衔接，最大地实现自己的学术价值。

“坚人志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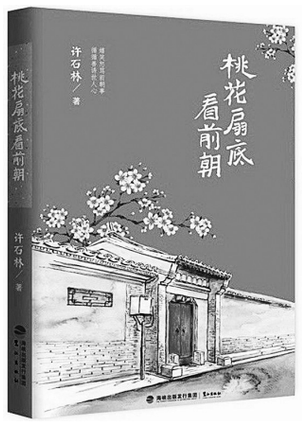
“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中转引了诗人、学者刘斯翰先生在一次讲座中讲到宋代苏轼和王旦的君子之风。苏轼最初反对王安石变法，得罪改革派，被贬黜边远；后蒙召赐还，适逢变法失败，苏轼又在众谤声里为王安石和新法辩护，认为不应全盘推翻，又遭保守派排斥打击，再贬黜边远。与北宋名臣寇准同朝的宰相王旦珍惜寇准才情，对他屡次在皇帝面前告状为难自己毫不记仇，遇事说事，公允正直。苏、王二人行为正体现了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这里的中庸之道并非骑墙，而是在胸襟宽广、气量宏大前提下、“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的仁者之道。唯如此，才能在汹涌的群体情绪中，从容地做到不偏不倚，而不是走极端、随大流。

其他如“黄道周：忠心佞口一孤臣”，“一辈子就为了的一个好死”，“所谓琴心——减少苟活的理由”，“守礼者无敌”等许多为“气节”和“正心”而罔顾个人利害的故事。这些掌故展现了众多尚义的古人，或可给尚利的今人多些触动与思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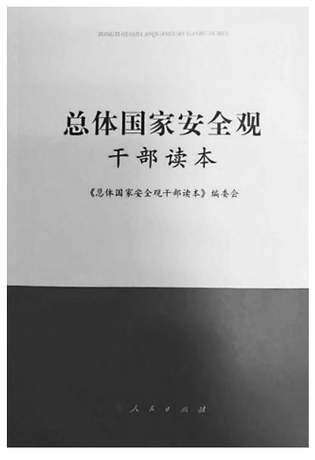
深情与信仰

文明的火种是人。先儒论人，以美德与学问为高，目的是培育士君子，而士君子是“良政美俗”的基石。人是制度的指向亦是制度的源头。这源头里的人是传续中华文明馨香并为中华民族光明未来不断添增火种的士君子。他们性情禀赋不同，但心志坚定，情怀相同，都怀揣一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赤子之心。许先生其文其人有士君子之风。

邹金灿先生在代序中说“一个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亲近与否，取决于其性情，有深情者自能近之，无深情者即使雅好传统文化，亦难体察个中幽微之处”。许石林先生坚信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文明的复兴之道，需要人带着真情去寻找去传播去实践。越读到后来，越感到这种深情近乎信仰，在兴趣、热情和持久的投入中默默酝酿，醇厚炽热。在深情与信仰中，许先生为“玉成和勉励今日的士君子”要告诉大家的是“不管权势如何显赫，不管金钱如何堆积如山，不管学问如何渊深，终究只有美德才能让人尊敬，只有人伦大防才能阻止社会堕落”。



好书推荐



书名：《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
作者：《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编委会
出版：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
推荐理由：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国家安全基本规律的把握，是新形势下指导国家安全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该书分五章，全面介绍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丰富内涵、道路依托、领域任务、法治保障和实践要求，系统总结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形势下我国国家安全工作需要回答和解决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精辟阐述。该书框架是在全面学习和认真梳理习近平总书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及其相关重要论述基础上设计而成的，主要观点、基本论断忠实于原意、原著，并适当展开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了重要辅助材料。



书名：《新加坡人才战略与实践》
作者：刘宏 王辉耀 著
出版：党建读物出版社2015年10月
推荐理由：该书从借鉴的角度切入，对新加坡的人才战略与人才引进的实践进行了完整细致的研究与剖析，着重阐述了新加坡在人才培养与开发、人才引进、人才融入三个方面的政策与实践，以及新加坡在这些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最后针对中国在人才引进方面的关键问题和需求，参照新加坡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可供借鉴的建议。